

20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丁 帆 主编

世纪名人评传

何其芳评传

贺仲明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暗哑的夜莺



何其芳评传
贺仲明 著

K825.6
HZ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贺仲明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20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丛书)

ISBN 7-81047-993-8/K·20

I. 暗... II. 贺... III. 何其芳—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0453号

-
- | | |
|-------|--|
| 丛 书 名 | 20世纪文化名人精神评传 |
| 书 名 | 暗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 |
| 作 者 | 贺仲明 |
| 责任编辑 | 丁亚芳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南京市宁海路122号 邮编: 210097 |
| 电 话 |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编辑部) 83598297(编辑部) |
| 网 址 | http://press.njnu.edu.cn |
| 电子邮件 | nnuniprs@public1.nj.36.cn |
| 照 排 | 江苏兰新印务发展公司 |
| 印 刷 | 丹阳教育印刷厂 |
| 开 本 | 787×960 1/16 |
| 印 张 | 18 |
| 字 数 | 295千 |
| 版 次 |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1-3 000册 |
| 书 号 | ISBN 7-81047-993-8/K·20 |
| 定 价 | 28.80元 |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对于知识分子精英而言,20世纪就是在一个启蒙与反启蒙的文化囚笼里挣扎着的困兽。他们所走过的逶迤精神天路更多的是充满着荆棘与坎坷,在启蒙民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困顿下,他们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之路,他们的精神成长为20世纪的文化提供了各种有价值的历史经验。鉴于此,早在2000年前后我们就展开过此选题的讨论,当时,王彬彬教授还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拖至今日才推出了第一批丛书。

我们的总体构想是:通过对每一位传主的生命历程的展示来透视其身处的时代风云,并且通过对他们各自的灵魂世界和文化人格的丰富书写,深刻地反思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和立场,及其所代表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深入研究他们各自的思想性格、人生道路以及精神历程,从而在复杂斑斓的心灵悲剧世界中去寻觅深刻的历史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套丛书就是一般的学术评传式的著作,而我们的目标锁定于:在20世纪的文化启蒙的语境下来考察每一位传主,寻觅他们各自在这一文化天平上所舞蹈出的精神足迹,使评传更具有强烈的思想文化色彩,既有较强的人文意识和思想性、学术性,同时亦具有较强的文学审美性和可读性,在自然、生动、流畅的文笔中,透露出对那一代知识启蒙者的精神追问。

从第一辑的四本书来看,我们的预期目标可以说是基本达到了。

《悲壮的启蒙——胡风评传》通过对胡风精神经历和人生历程的描摹,在几个大的历史事件中来展现传主“诗人型”启蒙的悲壮,从而凸显出他的伟大悲剧精神的弥足珍贵!同时也看到他在启蒙金字塔上坠落时的悲哀。胡风作为20世纪的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其坎坷的悲剧精神天路是永远值得几代知识分子记取的,他的精神历程的历史意义是大于他的悲惨人生遭遇的。从他的言行中,我们看到的是抽象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典型形象。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悟出一条真理:在启蒙与自我启蒙之间,20世纪的知识分子是走在一条没有航标的道路上的,即便像胡风这



样有铮铮铁骨的硬汉，也同样会迷失在统治思想之中而不能自觉的。这是启蒙者的悲哀呢？还是时代的悲哀？！我们试图找出历史给予的答案。

同样的问题当然也适合于像何其芳这样既有叛逆的诗人气质，又有循规蹈矩奴性的知识分子。《啁啾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就“深入到何其芳的生活和内心文化世界，从他的生活道路、思想轨迹和深层性格心理，去寻找何其芳的内在精神机制，联系到外在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发掘出何其芳道路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从而解答他从启蒙到自蒙的精神方程式。窃以为，何其芳这样类型的精英更能代表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似乎更可以窥见到 20 世纪中国启蒙之所以在艰难中失败的真正原因。

如果说在野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自我启蒙的眩惑中是受制于统治思想，那么，在朝的知识分子的境况又如何呢？《文章满纸书生累——邓拓评传》是通过对一个为官的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剖析，深刻地寻觅着邓拓为何在愚忠的逆启蒙道路上书写出最为悲哀的绝唱的。他的精神悲剧历程更带有一种传统仕子在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二律背反心理，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榜样。

五四的现代启蒙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汲取和借鉴，然而，在这一道路上，我们究竟能够走多远呢？那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本想在启蒙与反启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亦如鲁迅所言：“‘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通过林语堂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的描摹，为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在民主与科学/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旗帜下充满着悖论的心灵图画。我不知道读者诸君是否能够通过心灵的透视，悟出新世纪的启蒙事业“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道理，以林语堂为镜，为知识分子的双重启蒙作出新的选择。

我们的各位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努力地追求在审美的层次上将各位传主的精神世界予以艺术的表现，用或清新，或畅达，或舒缓，或激越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力图在自然流畅的表达中凸显有深度的见解。这一点在各书中的体现并不平衡，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修改。

虽然本丛书定性为“精神评传”，须侧重精神生活历程的探索，须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对于每一位传主研究的最新成果，要严谨求实，不要脱离史实的过多演义，但是，我们提倡用具有现代人文

和人性意识的价值理念去分析传主所经历的大的历史事件,去揣摩传主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真实心理和心理真实。我们以为,惟有此,才能更加接近真实,接近真理!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作者对人物心灵轨迹合理的想象与贴近真理的推断。

本丛书的撰写刚刚才迈出第一步,尚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传主在等待着我们去进一步发掘与探究,我们将在进一步遴选传主和作者的工作中,尽力将这一浩瀚的工程进行到底。希望读者诸君能够指出我们的不足,以使我们在今后的撰写过程中不断改进。

是为序。



2004年8月21日凌晨写于紫金山北麓

2004年12月17日修改于紫金山南麓

目 录

绪 论

我是谁? ——何其芳的悲剧意义	(001)
-----------------------	-------

第一章 万县之子

川东小城——万县	(008)
家庭与故居	(011)
爱的滋养	(013)
美的感悟	(016)
战争与漂泊	(018)
父亲的阴影	(021)
私塾生活	(024)
文学的诱惑	(028)
孤独的少年	(031)

第二章 万县求学

初出家门	(033)
太白岩下	(034)
“万县才子”	(037)
嘉陵江畔	(040)
少年文学梦	(042)

第三章 走出家乡

上海公学	(047)
初涉文坛	(053)
生命与孤独	(056)



清华之旅	(059)
------------	-------

第四章 爱情与诗歌

会馆生活	(063)
爱情之梦	(066)
北大哲学系	(074)
“汉园三诗人”	(075)
诗艺的深致	(079)

第五章 《预言》和《画梦录》

“京派”新人	(083)
浪漫与现实	(086)
故乡之行	(090)
《画梦录》	(093)

第六章 “摇醒成都”的日子

南开中学	(099)
再返故乡	(105)
莱阳师范	(107)
抗战与孤独	(110)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113)
周作人事件	(115)

第七章 《我歌唱延安》

到延安	(120)
《我歌唱延安》	(123)
鲁艺文学系	(128)
文人与战争	(131)
自我改造者	(138)
《夜歌》	(144)
《夜歌》之外	(151)
“歌颂光明”派	(155)

爱情与婚姻	(158)
第八章 整风前后	
延安整风	(163)
“投降者”	(166)
中共文化特使	(170)
宣传部长	(174)
幸福的被贬者	(179)
第九章 批评者的“《回答》”	
激进与疑虑	(182)
从作家到批评家	(186)
困惑的《回答》	(190)
文学研究所	(196)
诗人所长与青年导师	(199)
回顾与挣扎	(203)
第十章 苏醒与变异	
“现代格律诗”风波	(207)
《红楼梦》的“共名”	(215)
《论阿 Q》及其他	(220)
“不怕鬼的故事”	(223)
第十一章 “文革”十年	
未雨绸缪	(227)
惊涛骇浪	(229)
牛棚生涯	(232)
诗歌的交流	(234)
从“菜农”到“猪倌”	(236)
相濡以沫	(239)
“解放”之后	(241)
清醒与迷茫	(244)



曲线从文	(249)
第十二章 最后的岁月	
故乡再回首	(252)
最后的梦想	(254)
迟到的春天	(257)
遗憾的落伍者	(259)
永别人间	(263)
身后事	(264)
附 录:何其芳年谱简编	(269)
后 记	(277)

绪 论

》 我是谁？——何其芳的悲剧意义

毛泽东曾经笑着对何其芳说过：“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对于何其芳来说，这几乎是他一生的谶语。他给自己，给世人留下的，就是一个无尽的问号。可以说，“我是谁？”的疑问，是对何其芳一生最准确的概括和追问。

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来说，20 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艰难的时代。漫长的封建制度在这一世纪之初终于结束，中国社会跨出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步伐，中国文学也因之具有了全方位转型的基本前提。事实上，在随后进行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大“换血”过程中，文学承担了重要的先锋使命，以鲁迅等精英构成的现代文学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既以顽强的精神参与着社会文化变革，也艰难地蜕变着自我，追赶着现代文明的潮流。他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的贡献，甚至比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还要突出。

然而，长期封建体制所衍生的文化积习和 20 世纪社会变革的坎坷，注定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必然承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它的发展道路必

然是坎坷而曲折的。在鲁迅等作家于“绝望中反抗”和荆棘中前行时,也有不少作家屈服于各种政治权力的阴影之下,表现出了中国文人软弱和奴性的一面。周作人、姚文元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世纪变革期的艰难和沉重,赋予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壮,更给以文学为终生事业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命运涂抹上了强烈的悲剧色彩。

这一悲剧最典型的表现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优秀文学家都不能保持持久而坚韧的创作生命力,甚至很少有作家能够持续一生在文学事业上跋涉。最为常见的现象是,一个作家的处女作往往就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一生的最高成就,此后,他或者反复地重复自己,或者终结了自己的创作生命。20世纪的中国文学没能取得更高的成就,没有出现真正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与这一现象有着根本的关联。

这其中有一部分作家是在20世纪社会强大的外力压迫下放弃自己的创作的。如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就有丘东平、萧红这样充满才华的作家被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夺去了宝贵生命,过早地告别了自己钟爱的文学。在这前后发生的多次严酷政治争斗和运动中,也有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30年代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就是自然生命和文学生命都被外在政治力量彻底戕害的代表。60年代,老舍、赵树理等作家,也终结了他们的文学生涯。曾经创作过《边城》、《长河》等优秀作品的沈从文,从1950年至1988年的最后38年,完全与文学绝缘,不得不去从事古代服饰研究;22岁就创作出《财主底儿女们》和《饥饿的郭素娥》的路翎,从32岁起,整个创作生命就被终止,最后成为了一个半痴呆老人。还有著名的“九叶诗派”,“七月诗人”,同样几十年被迫与文学绝缘……

外在的压力不但能终结人的创作生涯,而且还会深入人的心灵深处,扭曲和异化着人的精神世界。在20世纪作家中,就有不少作家是迫于政治的影响,在躲避、恐惧或有意献媚的复杂心态下,主动地扭曲或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放弃了独立的艺术精神。这些作家文学生命力的萎缩,联系着他们自我精神世界的缺陷。

我们可以列举郭沫若、茅盾、曹禺、艾青这些现代文学的风云人物来作为佐证。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创者、曾经创作出气势磅礴而富有想像力的《女神》的郭沫若,在晚年写出来的却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这样的打油“诗句”;曾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先河的茅盾,建国后几乎没有文学作品问世;23岁就创作出《雷雨》,从而奠定了中国话剧基础的天才剧作家曹禺,

建国时才刚刚40岁,但这之后他所创作的几部剧作,却不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丝毫位置;还有艾青,40年代的诗歌巨擘,以一句“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抒发着全民族悲哀的艾青,在50年代写出的诗句却是“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大眼阔嘴巴”。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才华的作家,被作为是中国新文学的希望,却在有着一帆风顺仕途的同时,显示了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的创作生命。

应该说,作家们中断或萎缩自己的创作生命,并不完全都是自愿的,更多的情况与他们所遭受到的外部政治压力有关。所以,在上述许多作家的日常生活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内心的创作愿望与现实环境不和谐的现象。茅盾身居政府要职,却在躲躲藏藏中偷偷创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曹禺的晚年,也一直在痛悔中度过,虽然他不能再像年轻时一样为我们留下《雷雨》那样的杰作,但他发自心灵深处的真诚忏悔却足以成为我们非常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这是文学的坚韧力量与孱弱个体生命对于强大政治势力的艰难抗争,是文学对于现实利益和环境的超越。

20世纪文学上的这些悲剧,不仅是身在其中的作家们的悲剧,也不仅是这一世纪文学的悲剧。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对于这些悲剧中所包含的政治内涵上的反思,已经有众多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着,对于作家们心灵世界的拷问,许多有识之士也已经有了充分的重视。

在20世纪众多作家们的悲剧中,诗人兼散文家何其芳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意义。这并不是说在这些作家中,何其芳的文学成就最高,最富有创作才华,而是他文学生命的中断历程颇为独特,其中所蕴涵的曲折、坎坷和疑问特别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何其芳的人生和文学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在抗战之前,何其芳一直是以一个纯文学作家而知名的。他后来收在《预言》中的诗歌和《画梦录》中的散文完全是唯美文学的典范之作,他最初留给人们的形象,是一个感伤浪漫的瘦弱诗人,一个整天沉迷在文学梦幻中的青年。然而短短的几年之后,他却成为了一个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文学批评家。到后来,他更基本上放弃了文学创作,成为了一个行政干部,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何其芳形象转变的幅度之大,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是很突出,也是很少见的。

其次,何其芳在文学成就上的变化也非常明显。何其芳曾经是后期京派的新秀,既创作过文笔清丽、结构精巧的《画梦录》,又书写下袒露内心深



处困惑与彷徨的《预言》和《夜歌》，其清丽与真诚，曾经感染了不止一代青年人，甚至被看作是京派作家未来的希望。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后，何其芳就很少再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文革”劫难后所创作的诗歌更完全失去了诗歌韵味，与《预言》、《夜歌》时代相比，判若两人。其差别之巨大，很容易使我们想到五六十年代劫难前后的路翎。但何其芳的生活环境与路翎有很大的不同。路翎在劫难时代经历的是十余年的牢狱之灾，而何其芳的生活道路要顺利许多，他的退步教训更值得人们总结。

还有一点，何其芳也很具代表意义，那就是他在放弃文学追求时内心世界的困惑和痛苦。何其芳在漫长的改变自己身份的过程当中，内心世界之复杂和痛苦是非常深刻的，后来，他尽管走上了政府官员的道路，但在许多场合，他反复表达着自己对于放弃文学创作事业的巨大遗憾，并想方设法予以弥补。甚至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在计划写作长达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并抱着重病，坚持远赴外地体验生活。文学不可压制的坚忍力量，文学不肯泯灭的精魂，在何其芳的身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何其芳这些“改造”与“反改造”的内心苦痛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像他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创作的《夜歌》和《回答》，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改造痛苦的真实写照，具有特别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但是，由于何其芳性格比较内向，建国后又基本上停止了记日记的习惯，后期的创作也多是应景之作，他在转变过程中内心的许多衷曲无人知晓，其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寻和思考。

纵观何其芳的一生，他的形象身份不是清晰完整，而是暧昧支离的。24岁的《画梦录》诗人、作家，32岁的共产党文化“钦差”，45岁的《红楼梦》研究者，54岁的“牛鬼蛇神”，65岁开始写作一生惟一的长篇小说……何其芳的生活轨迹，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他们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道路，也失去了设计自己人生目标的可能性。在政治的推动和胁迫下，他们如同一叶飘萍，游移在不同的身份价值上，不能进行自己的控制与把握。可以说，“我是谁”的困惑曾深深地困惑着何其芳，也折射着整个20世纪中国作家命运的深沉悲剧性。

逝者已经已矣，但他所留下的疑问确实值得我们后人去思索、去追问。何其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角色转变？为什么会舍弃文学道路走上政治道路？又为什么在放弃文学创作时会有那么强烈的心灵痛苦？既然如此痛苦他又为什么还要放弃？他的文学水准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下降和退步？他

的困惑是真诚还是虚伪？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价值？早在延安时期，这些问题就引起过很多人的关注和争论。50年代初，何其芳在编选自己的散文选集时也曾产生过这样的困惑。何其芳去世十周年后的1987年，又有学者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并称何其芳这种思想进步而文学水平退步的现象为“何其芳现象”，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许多学者都参与过探讨。但应该说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本书就试着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惟一的方法，是深入何其芳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从他的生活道路、思想轨迹和深层性格心理，去寻找何其芳的内在精神机制；联系外在社会 and 历史文化背景，发掘何其芳道路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我们相信，在距离何其芳的生活年代已经有了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许多历史的真相已经得到披露，许多思想的障碍已经被扫除，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反过来，这一思考也能更促使我们对社会历史思考的进一步深入。

我们以为，何其芳悲剧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个人的性格，而这又与何其芳的生活经历和教育环境有直接关系。何其芳的性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软弱的。虽然他有时候很固执很倔强，但内心世界却缺乏反抗性。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如土匪的围困、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及亲人死亡等经历，尤其是父亲对他个性的强烈压抑，使他长期生活在孤僻之中，也养成了他脆弱、软弱的个性特点。这样，在何其芳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环境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渴望着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缺乏足够的反抗现实的勇气。性格的软弱，使他很易于去依赖一种强力，去躲避、畏惧乃至迎合，却不是批判、反抗现实。

何其芳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相当单一也是导致他精神悲剧的重要因素。由于童年时代个性的压抑和生活环境的囿限，何其芳过早地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文学内。他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基本上只局限于文学这一领域，他所惟一擅长，甚至可以说是惟一能够做的，只是文学这个幻梦。他没有广阔复杂的思想，没有独立成熟的性格，缺乏对社会和人生丰富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丰富的社会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他是纯洁的，但又是单纯的；他真诚，但有时候难免显得幼稚。如果在正常的岁月，何其芳的文学梦完全可能顺利地实现，甚至可能造就出一个纯文学的大师，但不幸的是，何其芳生活的岁月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季节，飘摇的时代风雨注定他的文学梦不可能长久地持续。这样，当何其芳的文学之梦最终不可避免地遇到冷峻的社会



现实的时候,他只能彷徨,只能犹豫,只能最终屈服,而不可能真正深刻地认识现实,形成真正坚决而果敢的反抗能力。可以说,从根本上而言,何其芳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的悲剧是一个诗人的悲剧。

当然,何其芳的悲剧不完全是个人性格和思想的原因,时代也担负了一定责任。我们绝对不可忽略他的悲剧在20世纪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何其芳的文化和精神缺陷,不只是属于他个人,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这也是在这一世纪中那么多知识分子缺乏个性、那么容易屈从于政治压力的重要原因。何其芳的人生道路,不只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严峻要求,他不过比别人走得更远,转变的幅度更大而已。他在延安时期的转变,和同时期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如出一辙,如丁玲、周立波、艾青等,都经历了与何其芳几乎同样的心路和生活历程。“何其芳现象”所体现的事实上也是许多共和国作家的共像。与何其芳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郭沫若、艾青、冯至、臧克家、卞之琳、曹禺、巴金、老舍、丁玲……在“思想进步”的同时,创作水准都无一例外地下降。这是一个特殊时代中作家们不可逃避的历史宿命。

需要指出的是,在审视何其芳的人生和文学道路时,我们并不认为他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纯美”走向现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从审美风格上,我们都认为这是何其芳个人对两种难分轩輊的道路的自由选择。正如《画梦录》与《夜歌》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学史意义,何其芳走向延安的人生经历也并不比他在北京读书时更缺少意义。

我们所否定的是何其芳文学心灵在政治影响下的屈从和扭曲,是政治对文学的侵袭与掠夺。我们认为,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何其芳,最大的遗憾就是文学心灵的扭曲和退化,是他在为政治服务信念下进行的政治化批评活动。而他最大的价值,也存在于那颗未曾彻底泯灭的文学心灵艰难的自我维护与抗争。这一抗争的最终失败,在于政治对他的全方位异化——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许多年的政治影响之后,何其芳从肉体到心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缓慢的、轻柔的,却又是彻底的,是最为残酷的。它体现着时间的力量,寓含着人性和生命的脆弱,更清晰地折射出政治无所不在的巨大威力——在这一威力面前,个人的抵抗确实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我们看到何其芳的变化,除了沉重而悲凉的压抑,还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何其芳的生活时代离我们已越来越远,在越来越远的将来,我们也将逐

步淡忘他的现实生活,只记住一个《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一个纯美的何其芳。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活生生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作为一个度过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作家,他的形象要远比他所留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复杂。我们不能以文学史的标准去苛求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相信,通过对何其芳这个文学经历和生活经历都非常复杂的作家的深入了解,我们肯定能够对20世纪中国社会,对生活于中国文化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有更全面的认识。如果确能如此,本书创作的初衷也就达到了。